

院長，內政部馬周輝，軍政部莫何應欽，財委會李子良，行政院王鴻烈，行政院秘書處吳澤英，蔣委員長，左舜財，財政部孔昭同，監察委員張靜江，司法院長，司法院秘書處黃子英，司法院秘書處陳其南。自左起第四人蔣南翔等被選出于英式地點手稿。

The 5th convention of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was held on April 1, 1946. This is the picture of all members present.



重庆抗战文化史

CHONGQING KANGZHAN WENHUASHI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 编著



重庆

CHONGQING KANGZHAN WENHUASHI

抗战文化史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 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自(CIP)数据

重庆抗战文化史/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5. 8

ISBN 7 - 80214 - 008 - 0

I. 重... II. 同... III. 抗日战争—文化史—重庆市 IV. K265.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353 号

责任编辑:宋庆光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 (010)65133603 652388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65244792(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unitypub@tjpres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重庆市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

装订:重庆市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

开本: 140 × 203 毫米 1/32

印张: 18.25 彩页: 0.75 印张

字数: 430 千字

印数: 3100 册

版次: 2005 年 8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80214 - 008 - 0/K · 285

定价: 40.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前　　言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载入了史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抗日战争，既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在那场空前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不仅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而且在抗战的烽火中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升华。这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继承和发扬。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些讲话，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战时首都重庆抗战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兹摘录如上，借作本书的前言，以与读者诸君共勉。

编著者 谨识

目 录

前言	(1)
导言	(1)
第一章 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26)
第一节 中国东部文化大西迁的英雄史诗	(26)
一、重庆：大时代前夕的准备	(26)
二、对日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35)
三、南京：中央大学浩荡西迁“鸡犬不留”	(43)
四、铁血壮举：沿海工业迁川与重庆两江经济带	(52)
五、从武汉到重庆：护送中国小公民的悲壮史诗	(57)
第二节 中国西部文化中心的崛起	(68)
一、内迁高校和文化科研机构云集陪都	(68)
二、重庆沙磁文化区的成立与扩展	(73)
三、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文化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87)
第三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堡垒	(98)
一、大重庆在日机的野蛮轰炸中	(98)
二、抗战到底民族复兴的精神堡垒	(124)
第二章 抗日的内政外交与舆论宣传	(139)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	(139)

一、二战爆发前后的国际风云	(139)
二、抗日的内政和外交	(145)
三、团结救国历史的象征	(152)
第二节 国民党的对外宣传与中央电台	(156)
一、国民党的对外宣传	(156)
二、中央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68)
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与对日宣传	(174)
第三节 空前繁荣的陪都新闻出版阵线	(177)
一、多元化的陪都新闻出版界	(177)
二、国民党官方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	(183)
三、中共在重庆的喉舌《新华日报》	(188)
四、代表中间民主势力的《大公报》及其他	(194)
第四节 抗战时期的新闻图书出版管制	(199)
一、国民党对新闻图书管制的强化	(199)
二、“六不”“五要”文艺政策与新闻图书审查	(203)
第三章 多元共生的抗日民族文化思想	(208)
第一节 抗战建国与多元文化格局	(208)
一、“抗战建国纲领”之下的陪都政治文化环境	(208)
二、重庆多元文化格局的统制和论争	(214)
第二节 官方哲学和社会各界多元哲学的发展	(223)
一、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与官方哲学	(223)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陪都重庆的传播及其在斗争中的 发展	(229)
三、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活动及“三位一体”哲学思想	(238)
四、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论争与蒋梦麟的《西潮》	(253)

五、现代新儒学与冯友兰的《贞元六书》	(259)
六、国民精神建设与佛教禅宗的思想	(266)
第三节 郭沫若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就	(272)
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辉煌业绩	(272)
二、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中的重大成就	(279)
三、从历史人物研究到《屈原》等历史剧的创作	(288)
 第四章 空前繁荣的陪都抗战文艺	(295)
第一节 陪都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295)
一、“文协”与异彩纷呈的陪都文坛	(295)
二、茅盾的现实主义道路及其代表作《腐蚀》和 《清明前后》	(304)
三、老舍和他的《四世同堂》与巴金的《寒夜》及其他	(311)
四、空前繁荣的中国戏剧文学创作	(318)
五、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与《七月》派抗战文学的成就	(333)
六、陪都的抗战文艺阵地和多种文学流派	(340)
第二节 大师云集的陪都艺坛	(348)
一、抗战陪都：中国的电影之都	(348)
二、音乐：民族解放的最强音	(352)
三、空前繁荣的陪都画坛	(359)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	(369)
一、对外文化交流概况	(369)
二、《百鸽图》、《海鹰图》、总统书卷及其他	(378)
 第五章 陪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的科学运动	(388)

第一节 教育的优先地位和多元格局	(388)
一、“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	(388)
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与陪都教育的多元格局	(396)
第二节 文化区：战时中国教育的缩影	(407)
一、重庆大学：文化区的砥柱和脊梁	(407)
二、中央大学在陪都沙磁文化区	(417)
三、南开学校与中国西部文化中心	(442)
四、中央工校与女子职业教育	(455)
五、战时中国的医药卫生中心与医药卫生教育	(462)
六、“乡建运动”与民众教育	(470)
七、抗战时期的特殊教育	(481)
第三节 战时中国的科学运动	(498)
一、科学运动中的西部科学院和中央研究院	(498)
二、资源委员会与中英科学合作所	(506)
第六章 陪都的民主宪政运动和抗战文化的终结	(513)
第一节 陪都的民主宪政运动	(513)
一、抗战后期的国际国内形势	(513)
二、国民党的宪政之路与《中国之命运》	(524)
三、国共关系与民主宪政运动	(535)
第二节 日本投降与抗战文化的终结	(544)
一、日本投降与国共重庆谈判	(544)
二、抗战文化的终结	(556)
结束语	(565)
后记	(571)

导　　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的凝聚和高扬

重庆抗战文化史，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凝聚和高扬，在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达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光辉顶点的辉煌历史。它融贯于千百年历史的大背景，与牵连着现代国际风云的大战争不可分离。这横绝千古的大时代的大文化，其所涵容的以数千万人民在战争第一线英勇奋斗流血牺牲而熔铸成功的伟大精神，到底是怎样发生并具体体现出来的？要回答这个重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便可穷尽的。在我们具体展开这部民族辉煌的历史之前，有必要先从此前中国的落伍和奋起开篇，从大时代的大背景说起。

中国的落伍和奋起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至少 5 千年以上连续不断文化传承的古老的东方大国，当西方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它自身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发展到为当时西方所不可比拟的巅峰时期。但是，从 15 世纪开始，我们就逐渐落后于西方，1840 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就是我们长期落后于人被动挨打的结果。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门洞开,一面引来西方列强不断的入侵,把中国沦为他们任意掠夺瓜分的半殖民地;另方面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使中国的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得以放眼世界,认清形势,萌生出强国保种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于是,自19世纪后期开始,在国内便兴起了一个长达百余年至今未竟的现代化过程。从企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开始,经中日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的连续失败,导致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以



孙中山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纲领和目标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君主的专制主义和两百多年满廷的种族主义统治,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全新的纪元。几年之后发生的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继辛亥政治革命之后发生的文化革命,实质上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在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都是在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思想和主张指导下前进的十分重要的时期。

不用说正当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迅速扩张的时候,我们国家这段血与火的现代化历程,每前进一步都与列强的在华势力有着复杂的联系,要受到这些势力的影响和牵制。但是,在1914~1918年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放松了彼此在中国的争夺,一面给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时机,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兴起的国际背景，同时也为新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政府扩张其在华势力范围提供了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德国的败落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为标志，使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日本以战胜国资格企图接管德国在中国占有的山东胶济铁路和青岛胶州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促使新文化运动迅即上升为反帝爱国的民主运动；二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先生则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并改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亲自领导和发动了著名的国民革命运动，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孙中山逝世后，北伐成功，除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后来在湘赣边区实行的割据之外，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定都南京，大体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从此，中国的国力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最低谷，踏上了逐步上升的途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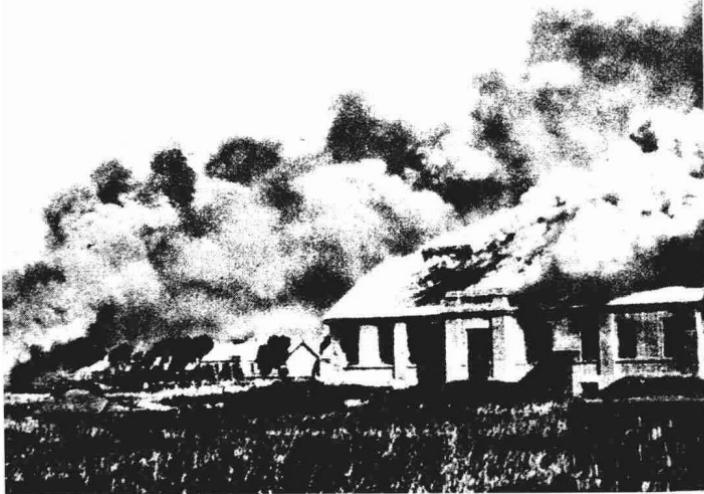
这自然不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乐意看到的。特别是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更是充满恐惧和仇视，因为中国的强盛必然会使其实现吞并中国的图谋变成泡影。



“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和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

中日之间的深刻矛盾

近代日本同中国的深刻矛盾，根子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专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不但长期存有领土野心，于蚕食鲸吞之余，甚而妄图用日本军国主义的皇国文化来取代和消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这种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和侵略行动，不仅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也侵犯了其他世界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日本因此成了远东战争的策源地和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1894年6月23日，日本发动了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获胜后迫使清廷与之签订《马关条约》，除获取中国赔款二万万两白银之外，还获得另外三项重大利益：（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使之脱离宗主国的保护，完全沦于日本军阀的铁蹄之下；（二）将我

国本土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割让出去，并入日本版图；（三）对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商埠，便利日商来华经营商务，获取超额利润。^① 后来，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获得中国偿银三千万两，而俄、德、法干涉“有功”，俄国得满州筑路权、采矿权，租旅顺大连；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租广州湾；英国趁机也租得威海卫及九龙半岛。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及附近岛屿割让，划入日本版图长达五十年，直至 1945 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失败之后才得以归还中国。美国为保持其在华地位及利益，于 1899 年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一）各国不得干涉在中国获得之一切既得利益；（二）中国关税统一，税款由中国征收；（三）各国在中国运输货物之运费，不得高于其本国之同等运费。这个机会均等的政策，于半年之内先后得到英、俄、德诸国的承认，对日本军阀独霸中国的野



日本军舰在嘉陵江上耀武扬威

^①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Ⅲ》第 1587 页。

心起到了一定的阻扼作用,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些原则。^①

但这只是暂时的,日本经过近 10 年扩军之后,独霸中国的野心重又抬头。1904 年 2 月,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两国海军先后在中国黄海和日本海上激战,至 1905 年以俄国全面失败告终。日俄在美国和谈签订《朴次茅斯和约》,规定把俄国攫取中国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支线的权利让给日本。从此,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上升,又开始对别国干涉其侵华的行动采取蔑视态度。1910 年吞并朝鲜。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夺取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利益;同时,趁列强混战于欧洲无暇东顾,及袁世凯投靠日本妄图称帝之机,于 1915 年逼迫袁承认其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据 1931 年 11 月英、美报纸披露,1927 年 7 月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三年之后,于 1931 年 4 月,日本军方参谋部制订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进而提出侵吞我国东北的三阶段方案:(一)组织亲日政权;(二)建立“独立国”; (三)吞并东北划入日本版图。^② 英、美等国为扼止日本侵华和称霸世界的野心,保护他们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美国总统哈定早在 1921 年就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并签订了中、英、美、法、意、日、荷、比、葡九国公约,规定缔约国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予中国以充分发展机会及维持稳固之政府,中国实行门户开放以维持各国在华工商业之机会均等,不承认某一国之特殊利益。^③ 1923

^① 参见陶恒生:《高附后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第 20 页,第 18 页。

^②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三卷上册,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13 页。

^③ 参见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年3月北京政府进而宣布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由于日本军阀独霸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往后的历史表明他们一直是按照既定的计划行事的。

所以毫不奇怪，1928年当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攻克济南直捣北京，日本即出兵山东企图阻挠，并于5月初酿成“五三济南惨案”。6月，国民革命军攻下北京。日本原拟扶持张作霖挟东北三省脱离中央，包办东北铁路和垄断满蒙经济，到此时因张已有不从之意，便于6月3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埋藏炸弹，将张作霖炸死。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恐慌，波及世界和日本，再度刺激了日本向中国大举扩张的野心，在1931年9月发动了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东北全境。接着将清废帝溥仪弄去东北作傀儡，于次年即1932年组建伪“满洲国”。为了转移世界各国的视线，又于同年初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迫使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同时调集部分军队进行抵抗，致淞沪抗战持续三个月之后，经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始得休战，签订停战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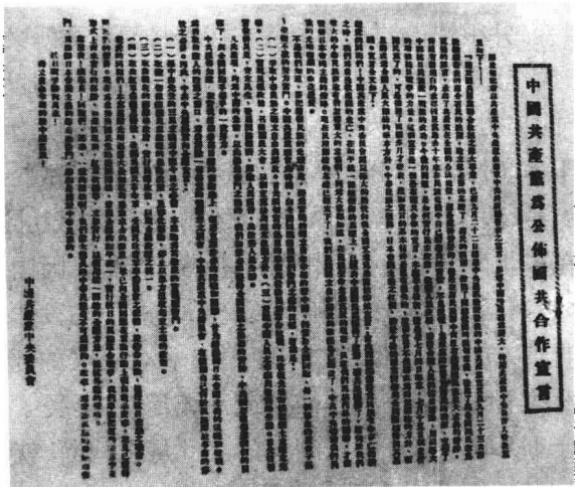
日本在东北得手之后，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因国际联盟投票不承认“满洲国”，日本于同年3月27日，淞沪之役休战后大约两三个星期，宣布退出国联，根本无视国际社会正义的呼声。只因日本自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尚不充足，才延缓了向中国内地进犯的行动。但其蚕食中国领土的事件从未间断，就其荦荦大者而言，有1933年的长城战役及“热河事件”，1935年的“河北事件”及“张北事件”，接着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直至1937年的北平卢沟桥事变导致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其间又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先后连成一线，无一不显示中日之间的深刻矛盾不

是因为日本统治者企图灭亡中国的举动所造成的。^①

因此，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蒋介石在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中断定：“此次中日战争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战，也是日本蓄意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和本党挽救中国的革命政策绝对冲突的必然结果。”

从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②

自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完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① 参见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上册第一章，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 参见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上册第一章，下册第六七八章；刘建武：《国民党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3期。